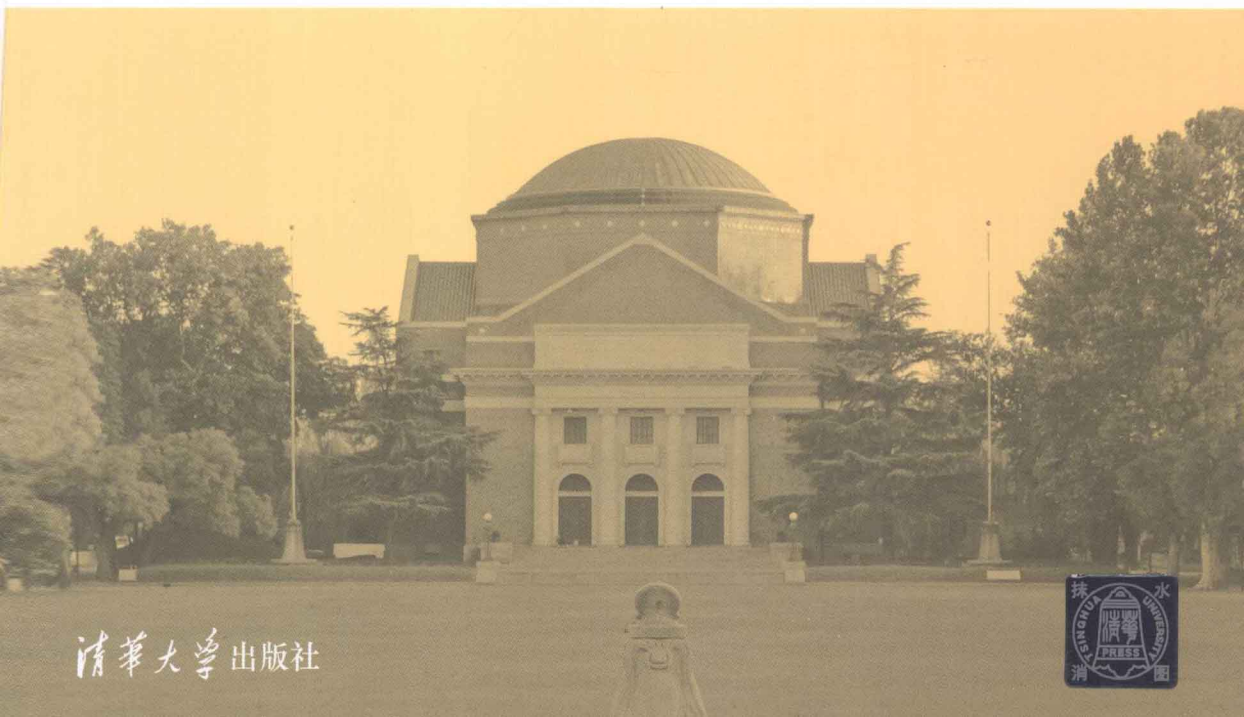


世纪清华

学人、学术与教育

李越 主编

刘超 叶赋桂 副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世纪清华

学人、学术与教育

李越 主编

刘超 叶赋桂 副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清华:学人、学术与教育/李越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302-34054-6

I. ①世… II. ①李… III. ①清华大学—教育工作—成就 IV. ①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5418号

责任编辑:刘美玉

封面设计:常雪影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25 字 数:417千字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500

定 价:56.00元

产品编号:052677-01

序

2011年,清华大学迎来了百年华诞,广大清华校友和有关各界都对此极为关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社会各界也借此推出了不少相关的图书、文章和音像资料。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学人们决定借此良机,以学术的方式来庆祝清华的百年华诞,由于清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对清华的学术研究无疑是清华教研院应尽之责并有其特殊的意义。

清华教研院学人希望通过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作品,系统呈现关于清华研究的前沿水准,集中展现海内外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最新学术进展。为此,教研院的学人们邀请学界同人共襄盛举并获得热心支持,于是有了这部厚重的论文集的问世。书中作品均为各位研究者精心结撰的专题论文。这些作品涵盖了人物、事件、制度、学科、办学理念等多个方面;但集中在学人、学术和教育等领域,并以文科为主。它们虽风格各异,但都体现了“原创、专深、可读”的特征;这些论文大都平实、厚重且不乏新意,学术含量尤为突出。论文作者中,既有久负盛名的资深学者,也有时下非常活跃的“少壮派”学人,亦不乏“80后”的学界新秀。论文的结集,也就促成了数十名学者济济一堂的盛况。本书既见证了一个学术领域的多年积累和前沿进展,也彰显了年轻研究者的成长,足见本领域的研究工作颇具活力并后继有人,令人欣慰。这些作品也集中体现出学界一直以来对清华的高度关注和期待。这于我们而言,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

大学是人类文明传承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枢纽。百余年来,清华在中国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中有着特殊的贡献和地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清华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和“行胜于言”、“人文日新”的传统,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也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校史”与“国史”息息相关,清华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始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长期以来,经过一代代人薪尽火传的持续努力,清华学人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专业精神和治学风格,清华大学也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大学精神和办学

风格。

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清华学人就已逐步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精神气质和学思风格，这批学人既有专业精神又有现实关怀，既有家国情怀又有国际视野，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现代眼光。他们主张和而不同、博采众长。因而往往富有通才修养，博学而多能。从国学院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吴宓，到后来文学院的冯友兰、金岳霖、蒋廷黻、雷海宗、闻一多、朱自清、张荫麟、浦江清等，莫不如此；理工学院的学人们如叶企孙、顾毓琇、刘仙洲、王竹溪、张子高、梁思成等都有重大建树。这种中西会通、古今贯通、文理融通的治学祈向铸就了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由此也孕育出了一大批博学多能的知名学者和骨干栋材。

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当时清华办学者和学人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博学硕才，实现学识上的“通知”，而且有着为人、为学的共同追求。梅贻琦校长在《大学一解》中，强调“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是《大学》开章名义之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指出今日大学教育始终未能超越“明明德”和“新民”之二义。认为大学教育应该坚持“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因为“以无通才为基础的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这里的通，不仅仅是学识之通，而且也是对为人与为学，“明明德”与“新民”的共同要求。正由此，清华学人的道德文章均能有着“止于至善”的境界追求。这一点，至今值得我们关注与弘扬。

清华学人注重继承传统，更注重开拓创新；他们有着强烈的开拓精神和突出的原创能力。老清华的学人们大都能对古今中外各个学科的学术养分大胆“拿来”，经过独立的批判继承，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成果，使得清华学术在这种兼容并包、竞存互动中保持活力、蓬勃发展，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清华学人对道德文章的卓越追求，加上这种自由、开放、活跃的学术环境，造成了老清华在学术上的辉煌。

正是这一系列显著特征，促成了清华大学和清华学人形成了自身的精神气质和学术风格。他们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科技、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清华的发展史，高度浓缩了长期以来中国学人追求学术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心路历程，也浓缩了中华民族精英学者不断探求科学真理的百年历史。

这种可贵的治学经验和学术精神已成为清华传统的一部分。而这种学术

传统或清华精神,是超越时空的。新清华与老清华虽然有着种种差异,但二者“顶天立地树人”的教学科研理念有着明显的延续性,清华学人为国家培养人才、追求学术独立、民族复兴的宏愿也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点在本书所列的不同领域的清华学人身上得到了生动地反映。

当然,在翻阅本书时,我们也不能不发现其中的美中不足:一是对清华的理工学科,学人的研究尚不充分;二是对新清华新时期的发展和学人的研究还相对欠缺。

清华的各院系、各学科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办学特色。本书论文中涵盖了国文、外文、史学、社会学、教育等学科。众所周知,无论是老清华,还是现今的清华,其文法学科均驰名中外,而其理工学科也是久负盛名,自然也值得深入研究。而本书对后者的关注,显然是很不相称的;书中论文所研究的清华历史,止于20世纪60年代,尤其集中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最近四十多年来清华的发展历程则未有涉及。如果从1952年院系调整起算,新清华至今已有一个甲子的历史,历史的长度已明显超过老清华了。虽然在这段并不短暂的历史中,有过许多曲折,但是无论从经验或是教训来看,还是有很多问题值得总结研究的。

在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后,清华由一所综合性大学转变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当时,没有固守已有的工学学科,也没有按照苏联专家所言,将清华办成一个水电学院。而是在蒋南翔校长带领下,在国内敢为人先地创设了一系列新兴专业(如工程物理、工程化学、计算机、自动化、无线电电子学、精密仪器等),包括若干理工融合的专业。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又逐步恢复了综合性大学的办学格局,并凝练出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模式和思路。这一进程,凝聚着许多清华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在新清华的发展历程中,很多系科、人物、事件、办学理念或政策措施,同样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例,蒋南翔校长的一系列开拓性努力基本奠定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清华的办学风格、学科布局 and 校务领导体制。清华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取得了突出的办学成绩,培养了一大批的学术大师、兴业之士和治国之才。这在当时国内各大学中是非常突出的。蒋南翔校长提倡“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实行“关注个性,因材施教”的建设三支代表队的教育思想;注重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推进教育一科研一生产相结合,倡导真刀真枪毕业设计,并在全中国首创了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清华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工作中所

造就的这大批优秀人才，日后大都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甚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我们的国家工业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民族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华又与时俱进地形成“一个根本，两个中心、四项职能”（即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成为国家重要的教育和科研中心，完成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四项职能）的办学理念，提出要将学校的一切优势转化为育人的优势，要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骨干人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清华发展进入新百年后，学校又确立了“世界水平、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办学方向，形成了一系列新思路，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这些课题，显然也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系统地研究。

当然，无论如何，本书的作品已在整体上较好地体现出了“世纪清华”的诸多侧面，其中有“学人”风采、“学术”精神和“教育”传统等。本书的问世无疑是新百年深入研究清华的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期待后面的研究工作能做得更好、更全面、更扎实、更深入。本书是南北各地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也凝聚着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许多同仁的努力和心血。在此，请允许我向所有推动或参与本项工作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深切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清华对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负有特殊的责任，对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有着特殊的使命。对此，所有清华人责无旁贷。我们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清华的支持与厚爱，也衷心祝愿清华继续开创办学工作的新局面，在新百年里再铸辉煌！

胡显章

2013年暑期于清华园

目 录

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

- 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 陈 来 /1

一次宁静的革命

- 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 罗志田 /20

- 浅析蒋廷黻思想与学术的理论基础 蔡乐苏 /33

蒋廷黻与翁文灏：从亦步亦趋到分道扬镳

- 兼析翁文灏“老大哥”形象之意涵 刘 超 /53

- 《新民丛报》创办动机与梁启超的近代国家思想 刘珊珊 /71

- 罗家伦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述论 冯夏根 /84

- 蒋梦麟离开联大考 马 勇 /95

- 钟情于两汉史的社会学家吴景超 吕文浩 /108

- 吴景超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研究趋向 阎书钦 /122

“科学”与“艺术”之联姻

- 试论张荫麟的通史理想 李欣荣 /138

张荫麟论墨子与墨家

- 纪念张荫麟先生逝世七十周年 胡 兵 /146

- 作为清华图书馆馆长的潘光旦 何 玉 高 瑄 /161

吴承明先生与清华学生运动

- 以“一二·九”运动为中心 张天虹 /167

政治、学术与情感

- 胡乔木的中共党史研究 陈建波 /179

- 论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祝猛昌 /194

在中西新旧之间穿行

- 五四前后的清华国文教学 欧阳军喜 /208

- 1929 年私立南开大学教授流入国立清华大学的分析 宋秋蓉 /223

清华大学外文系与中国现代戏剧	姚 峰	/231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清华学人与山东大学古典文学学科传统	马庆洲	/241
略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清华大学教师聘任与		
晋升的具体实践	邓小林	/251
民国时期清华教职员住房状况初探	梁 晨	/268
论大学史上的罗家伦	张晓唯	/279
“在通而不在专”		
——梅贻琦通才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吴洪成 甘少杰	/294
西南联大与云南地方教育		
——以师资培养与地方办学为中心的考察	闻黎明	/309
西南联大教授会研究		
——以出席情况及其职能为中心的考察	朱 俊	/327
清华大学 1958 年“教育革命”一瞥	唐少杰	/338
院系调整中的清华大学扩充方案	金富军 孙海涛	/351
“十七年”时期清华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办学模式比较研究	段 蕾	/361
百年清芬：生生不息的清华理念		
——为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而作	叶赋桂	/372
编后记		389

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

——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

陈 来*

2009年,新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在一定意义上说,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当然是对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继承和重建。要建设好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正确掌握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基本方向,就需要全面、深刻地认识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典范和历史意义。因此,若要全面认识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历史意义,则必须对近代国学观念的嬗变有一个总体了解,并在此总体了解的前提下,对国学概念的实际流行的复合层次做出基本分析。而晚近学者对近代国学概念及其讨论的梳理,资料收集甚为丰富,但较缺少概念的辨析和理论的把握^①。为此,本文将从几个大的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分析“国学”的观念意识。关注国学语词背后的时代观念及其意识,注重其在早期的变化与社会文化思潮的联结,并将其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二,阐明“国学”概念定义的几个基本意义。以往学者的国学定义主要在国学的对象范围上着眼,本文强调的是把“国学”作为一个近代研究体系的意义。因为很明显,所谓“新国学”的提法和讨论,当然是指研究体系而言,研究的对象范围则无所谓新旧。第三,区分国学研究体系在近代演进的几个阶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论述到1920年代末期,即整理国故运动的后期为止。第四,关于近代国学大家的几个主要形态,这和国学研究演进的阶段是相对应的。以上的不同分析最后都归向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求呈现和理解其在“国学”领域作为学术典范的意义。

*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① 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桑兵等:《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08;桑兵等:《国学的历史》,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一、国学观念之发生与演进

为了凸显近代以来“国学”观念在不同语境的复杂性，以下从三个方面试图加以呈现，即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及东方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相适应，这三个方面展开为三个阶段的发展。

晚清民国之交，中华民族历经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屈辱，遭遇了空前的国家危机。这一危机不是个别的经济的或政治的或外交的危机，而是一种总体性的危机。这个总体性的危机就是在世界列强贪婪的攫取态势之下，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让步后，有可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这种民族危机，在甲午战争以后已经普遍地被当时的中国人意识到了，从而激发起了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在此种形势下，对国学概念的思考与中华民族的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学”成为当时表达民族思想的一个方式，其代表即邓实与晚清国粹派。当时整个国家的民族危机非常严重，国粹派人士认为国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就此，他们提出了“国”和“学”的关系。如黄节曾说：“立乎地圉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掺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昔者英之墟印度也，俄之裂波兰也，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焉。迄今过灵水之滨，瓦尔省之郭，婆罗门之贵种，斯拉窝尼之旧族，无复有文明片影留曜于其间，则国学之亡也。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①

同样，邓实主张“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②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叠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故近日国学之亡，较嬴秦蒙古之祸尤酷……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学也者，政教礼俗之所出也。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③他还指出欧洲人殖民主义的老谋深算，“其希望

① 黄节：《国粹学报叙》，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17页。

② 邓实：《国学讲习记》，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81页。

③ 邓实：《拟设国粹学堂启》，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89页。罗志田以为此文可能为刘师培所草，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63页。

伟,其谋虑深,其亡人国也,必先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次灭其种姓”^①。

黄节、邓实的这些提法凸显了他们对中国作为国家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双重忧患,按照这个观点,一个国家与其国学是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国家依靠其国学而生存,国学依赖有国家而昌盛。

这种观点在当时为不少人所主张,许守微也说:“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②在这种说法里,亡国的迫切感更为突出,它表现出,面对国家的形势危急,当时有部分人甚至认为国亡已经难以避免,因此要学习明末顾炎武的想法,通过保学来避免永远亡国,用保学来期待再造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吸取了晚明部分士人的想法,即假如国家亡了,学术不亡,国家还能复兴;如果国学也亡了,国家就无法复兴。国粹派将国学的兴亡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国学这一概念,保守固有文化,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

对国学的如此深忧,反映了他们对亡国灭种的极大恐惧。这样的“国”与“学”的讨论,不能不影响到“国学”二字的理解和使用。在这种对深重的民族危机的自觉之下,邓实说:“夫自国之人,无不自爱其国之学。”^③邓实特别强调国学与爱国心的关联,如他说“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依属,而神州或可再造”^④,认为民族之文化是该民族之思想的基础和来源。许之衡认为,“国魂者源于国学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⑤,黄节更主张“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⑥。梁启超也认为:“凡一国之立于天地也,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者爱国之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之矣。”^⑦在梁启超等人看来,国学就是本其爱国之心,为国家和民生伸张之学,

① 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人种独立》,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23号。类似观念还见于姚光:《国学保存论》,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96页。

②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60页。

③ 邓实:《国学复兴论》,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70页。

④ 邓实:《国学今论》,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49页。

⑤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56页。

⑥ 黄节:《国粹学报叙》,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18页。

⑦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中国几千年绵延至今，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上仁人志士倡导国家大义而影响民心。邓实、刘师培创办《国粹学报》，大意皆出于此，《国粹学报》发刊词便明确声明，“保种、爱国、存学”是该刊的志向。

邓实又指出：“国学者何？一国自有之学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①爱学即是爱国，爱国所以爱国学。所有这一切，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都是建立近代“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②，所谓国学乃立国之根之论，皆当如此观之。可见，晚清国粹派“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主张，实际是爱国主义文化观的体现。

桑兵指出，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及其使用，始于20世纪初，受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学术变化的影响^③。这是就语词的使用而言。而就观念意识来看，清末国学倡导者的言论，受顾炎武文化意识的影响匪浅。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说法，常被转换为亡国与亡国学的关联，盖顾炎武所谓天下本是作为礼俗政教的文化而言。

可见，清末国学之名所起，并不是因反满而立，虽然邓实、黄节都是赞成反满革命的，这一时期国学保存论者的出发点主要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欲亡中国而言。他们的主张，不是强调“研究”国学，而是“保存”中国文化，以求促进国民的爱国心。可见此时国学概念之提出，主要是政治取向的，而不是学术取向的，国学说是当时救国论述的一部分。邓实曾说：“不知爱吾祖国之文明，发挥而光大之，徒知爱异国之文明，崇拜而歌舞之。呜呼，吾想百年后，东洋之文明亡，文明亡而其发生出此文明三千余年之祖国亦亡。”^④我们必须知道，邓实和《国粹学报》的这些人绝不是主张排斥西方文明，而是主张两大文明之融合，所以他们注重保存国学，并不是针对欧化。这一点许守微说得最为明白：“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⑤

章太炎也是一样，他从亡国的印度历史那里了解到“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他更提出著名的口号“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

① 邓实：《国学讲习记》，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81页。

② 梁启超：《新民说》，见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上，12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③ 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④ 邓实：《东西洋二大文明》，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185～186页。

⑤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61页。

的热肠”^①。章太炎主办《民报》时所刊的《国学讲习会序》中又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②章太炎是革命党人，尽管革命党人也有倡导欧化，不主张保存国粹的，同样是爱国忧国的人士，但章太炎的主张在革命派内部深有影响。

近代国学的观念，从20世纪初到1920年代末，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如上所说，第一个阶段是晚清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国学”，体现的是一个政治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学术的观念。国学当然是指学术文化，但20世纪初提出“国学”时，其出发点是本于爱国主义的立场、着眼于政治的救亡。晚清国粹派提出的“国学”是一个基于爱国主义观念的概念，他们自己也明确使用了爱国主义的语词。他们的基本观念是，国学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语言，是和这个国家的兴亡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救亡图存，必须保存国学。

邓实、黄节在1905年提出了“国学”的概念，1907—1908年章太炎也使用这个概念，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心。晚清这些人的国学概念，都是为了激励大家的爱国心，有一种很明显的救亡保国意识，即通过捍卫国学、保存国学来救亡保国、保种保教。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国粹派虽然强调要保存国学、守护文化，但并不反对革命，这些人都属于革命派的一翼。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对此有清楚的分析^③。

第二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到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国学作为一个核心词汇用得较少，但从观念上看，国学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其问题意识仍吸引着社会的关注，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1915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讨论东西文化的优劣，可以说其中讨论的中国文化的问题就是国学问题。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基本理念和基本学术倾向，这些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变成了讨论的中心，虽然这时国学作为关键词出现不甚普遍，但作为问题意识是始终存在的。所以，这个阶段的国学观念主要是文化意义的，而不是政治意义的；人们关注的不是把国学作为国家兴亡的文化基础，反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批判原有文化，引进西方文化价值来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化。这个阶段有关“国

① 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印度人论国粹》，见《章太炎全集》第二卷，第4册，203、3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② 《国学讲习会序》，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77页。

③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32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学”的问题意识突出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这个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举出1919年毛子水的《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一文，仅从傅斯年为其文作附识、胡适写长信与之讨论便可见其代表性。毛子水所讲的“国故”和清末人讲的“国学”意义相近，他的定义是“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但与晚清国粹派不同，他不是主张珍视国学国故以为民族国家立国的基础，而是认为“我们倘若单讲到学术思想，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他更认为：“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①这种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所作的对于国学的的评价，与晚清的关注全然不同，更多的是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

自然，在文化观念上，与这一时期主流的批判传统思潮不同的主张也同时存在，如毛子水的文章发表后立即有张煊的反驳文章回应，但毛子水的观点是一时的主流，是无可否认的。虽然新文化运动并非以国学为关键词，但其批判旧文化的锋芒，显示出国学仍是主要关切的对象。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争论是启蒙思想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要指出的是，重视保守中国文化的学者虽然强调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价值（如梁漱溟到北大说我是来替孔子和释迦说话的），但他们并不反对“欧化”，并不拒绝、反对西方文化，正如晚清国粹派在政治上并不反对革命一样。与《新青年》杂志文化观念不同的《东方杂志》同时大量介绍西方文化，主张东西文化融合，是人们所熟知的。1920年代前期《学衡》杂志出现，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接续《东方杂志》的方向，其对中国文化的持守和信念，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但绝非反对和拒绝西方文化。这也是第二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个阶段就是1920年代初期到末期，这一时期，国学的概念开始广泛流行，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了。在“国学”概念下面所谈论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文化，而是学术研究。这种情形和这一时期发起、流行的整理国故运动有关。1919年年底，胡适吸收了毛子水和傅斯年的概念，肯定了“整理国故”的提法。当时胡适的影响很大，而傅斯年等人还是学生。“整理国故”经胡适肯定

① 毛子水：《国故与科学的精神》，见桑兵等：《国学的历史》，142～144页。

之后渐渐发生了影响,其影响所及,首先是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正式名称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俗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此后1924年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正式名称是研究院国学门,通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1928年燕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其他各地成立国学专修机构或学校,不一而足,其中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最有名。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了一个新的运动即整理国故运动,它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今天的“国学热”(当然跟今天“国学热”还是不能相比的,它主要还是在学术层面上,也还没有形成一个全民的文化“国学热”)。应当说,192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逐渐发现了研究国学的重要性,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了国学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国学研究院所与类似机构。

与成立国学研究院所相关,这时的学术界出现了多种有关国学的定义。虽然国学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但这些定义所突出的理解,都是在学术的层面上,已经既不是强调政治(晚清),也不是突出文化(“五四”),而是注重如何发展学术研究。国学的观念在从晚清到1920年代三个阶段的基本变化反映了人们不同时期对传统文化与时代使命关系的认识。

1920年代,国学的关注进入了第三阶段,虽然文化启蒙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仍在进行,但保守主义并非反对西方文化,而是承认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必要性(如梁漱溟)。且文化保守主义已经结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潮流,融合中西的文化主张并非容易击倒。启蒙阵营也分化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但在启蒙阵营,新文学观念与整理国故交杂纠葛,一元化的思维方式支配了多数新派学人,把启蒙与国学对立起来(如吴稚晖),以为要启蒙就必须排斥国学。所以,整理国故运动中真正开花结果的反而多是持保守主义文化观的学者。

不管如何,此时国学的概念已经与邓实时代不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的概念了。“学术国学”论说之发展日渐明显,与邓实时的“爱国国学”的论说已大不相同了。

二、国学概念之使用

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应该可以分为几种。作为一个近代的文化概念而不是古代教育的设置,“国学”与“西学”相对,是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

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这是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第一种用法。这里的“国”是本国之义；“学”是学术之义。用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的提法，国学可称“中国独有之学”^①；用刘师培后来的说法，则可称“中国固有之学术”^②；东南大学国学院的提法以国学为“中国原有之学术”^③。后来1930年代王缙尘《国学讲话》称：“国学之名，古无有也，必国与国对待，始有国家观念，于是始以己国之学术成为国学。”^④从历史上看，根据章太炎等人的讲法，国学之提出，是指中国固有的学术，这个意义的“国学”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一直都比较流行。

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的时候，吴宓在《研究院缘起》中表达了对清华国学院的理解，^⑤后来又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加以强调：“兹所谓国学，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⑥吴宓所用的国学概念，定义了国学的对象和范围，是当时各个国学院所表达得最清晰的概念。这个定义以学术形态的文化为主，故称“学术文化”，不包括民俗文化等非学术内容；此外，他重点强调学术文化的“全体”，意谓不能仅以传统学术文化之一种（如儒家或道家）代替其全体。至1990年代初，张岱年先生写《国学丛书》序的时候，还是讲国学即中国学术，这是流行最广的国学定义。

第二种是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以国学为“中国传统学术”和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用法的区别在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外延要小于“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往往无所不包，而前者侧重于学术形态的文化。当一个概念提出之后，其意义就会不断地扩张，不同的人对之有不同的意义之使用。在一般的意义上把国学当作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的意义就比较广泛了，它不仅是学术形态的文化，还可以将不是学术形态的文化包括在内。不仅是民俗文化，还有其他各种层次的文化，都被包括在内。这样的“国学”概念就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了。新文化运动聚焦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所以这种以国学指中国文化的概念，其使用与当时文化论争的焦

① 章太炎说：“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见氏著：《章太炎政论选集》，2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② 此为国故月刊社之宗旨。

③ “要之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分析为言，则中国原有学术……”见《史地界消息·北大出版之两种季刊与史学》，载《史地学报》，第2卷，第4期，1923年5月。

④ 王缙尘：《国学讲话》，1页，上海，世界书局，1935。

⑤ 《研究院缘起》，载《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10月25日。

⑥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载《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